

坐而论道

王向远教授讲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

王向远 著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王向远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王向远 主编



王向远教授讲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

坐而论道

王向远 著



中央编译出版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坐而论道 / 王向远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ISBN 978 - 7 - 5117 - 2160 - 0

I. ①坐… II. ①王… III. ①比较文学 - 文学研究 -

文集 ②文学翻译 - 文集 IV. ①I0 - 03 ②I04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1659 号

坐而论道

出 版 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邓 彤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52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24.7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66509618



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 山东人, 文学博士, 作家、翻译家。

1996 年起, 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01 年起, 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导师, 兼任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东方文学与日本文学、文艺理论与美学、中日关系等。

著有《王向远著作集》(全 10 卷, 400 万字, 2007 年版)及各种单行本著作 23 种(含合著 5 种), 发表论文 200 余篇。著作(非重复字数)共计 500 余万字。

译有《日本古典文论选译》(二卷四册)、《审美日本系列》(四种)、《日本古典诗学汇译》(二卷)及井原西鹤、夏目漱石等日本古今名家名作。译作(非重复字数)约 300 万字。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起步发展，到现在为止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已经有了丰厚的知识产出和思想建树。它的异军突起，是当代中国一道引人瞩目的学术文化景观，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鲜明印证，也是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

三十多年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史已经表明，要在人文研究及文学研究中建立世界观念和视野，要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研究，要把外国文学放在中国文化立场上加以审视和阐发，要连接中外文学，要打通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壁垒，要把细致微观的实证研究与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相结合，那必然会走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在这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比较文学”是学术观念、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世界文学”则是学科资源与研究视野。它在贯中外、跨文化、通古今、越科界的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上的优势，使其无可替代地成为当代中国学术文化中最有时代性、最有包容性、最有创新性的高端学科之一。

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不仅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等方面生产了大量的新知识，而且逐步建立了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理论普适性的学科理论系统，逐步完善了比较诗学、中西比较文学、东方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等分支学科，在学术成果的质与量

上已居世界各国之首，还全面进入了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从而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当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和中心，代表着世界比较文学兼收并蓄、超越学派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收在这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的作者，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上，是继季羨林、乐黛云等老一辈学者之后的第二代学人。这些作者固然只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一部分，却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现年多在四十五至六十五岁之间，从学术年龄上说大体属于中壮年，都是各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大都在1980年代后走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道，1990年代后崭露头角或脱颖而出，进入20世纪后的十几年里，更成为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他们有幸拥有了可以安心治学的环境，赶上了数字化、信息化的新时代。既抬头看世界，又埋头务笔耕，既坚持学术的严谨，也保持思想的活跃，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充分发挥了中国学者的学术优势和想象力、思考力、创造力，取得了与时代要求相称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是个人学术履历的证明，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份奉献，更成为新时代“国人之学”即“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二十卷，选题上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理论为主，以讲述和示范学术方法为要，涉及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基本理论、比较诗学、东方文学及东方比较文学、西方文学及中西文学关系、世界文学总体研究等方面。各卷均按一定的范围和主题，将作者有原创性、有特色的成果收编起来，将大学讲堂搬到书本上来，以读者为听众，以写代“讲”，以言代“堂”，深入浅出，以雅化俗，汇集中国比较文学第二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以使五指成拳、十指合掌，形成大型丛书的规模效应，得以占书架之一角，入读者之法眼，从一个侧面展示近年来中国比

较文学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而且，不同作者及著作之间也可以相互显彰、相互映照、相互补充，读者也可以在异中见同、同中见异，在参读和比照中领略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和世界文学，得窥比较文学殿堂之门径。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资助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支持，编者和作者深表谢意！

愿“讲堂”满座，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事业更加繁荣！

王向远

2014年4月20日

自序：我的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研究的十五个关键词

此次编辑《坐而论道——王向远教授讲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的论文集，使我有机会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加以回顾和整理。在二十多年来的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领域中，我写了关于学科史、学科理论、个案研究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要以简短的文字加以梳理与说明，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较为便捷的办法就是找出相关的关键词，并以此为中心加以概括。对于学术理论研究而言，关键词，即重要的概念和范畴既是研究的核心词，也是基本的落脚点或归结点。归根到底，理论的创新是思想的创新，思想的创新是表达方式的创新，表达方式的创新是语言的创新，语言的创新的标志是概念范畴的创新与更新。这么说来，还是从“关键词”入手，较得要领。

我的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如下十五个(组)关键词：一、东方学；二、东方比较文学；三、宏观比较文学；四、比较语义学；五、系谱学方法；六、传播研究法·影响分析法；七、平行贯通法；八、超文学研究；九、涉外文学；十、民族文学·国民文学；十一、跨文学诗学；十二、译文学；十三、逐译、释译、创译；十四、异化·归化·溶化；十五、创造性叛逆·破坏性叛逆。

一、东方学

“东方学”这个概念，自然不是我创制的，但近几年来，我对它做了正本清源的厘定与廓清，并把“东方学”作为一个学科加以提倡。

自从萨义德的名著 *Orientalism* 被照字面被译译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以来，造成了“东方学”概念在中国的歧义和混乱。一些人误认为“东方学”是西方歪曲贬低东方的渊藪，殊不知真正的“东方学”是一门有数百年历史的源远流长的学问，在当今欧美各国和日本、韩国等，都相当发达。我们中国也有“东方学”。实际上，萨义德的那本书讲的不是作为学问或学科的“东方学”，也不是原始意义上的主张东方、宣扬东方的“东方主义”，而是分析批判了西方人的“东方观念”或“东方观”，因而译为“东方观”似更合适。由此，我主张廓清“东方学”与“东方观”、“东方观念”、“东方主义”之间的关系，还原“东方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意义与价值。

我认为现代中国的学问，按空间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是“国学”（狭义的），第二是“西方学”，第三是“东方学”。“东方学”是研究除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的学问，在当代中国已经有相当的学术积累，但却一直处在“有实无名”的状态。当务之急，是以“东方学”这一学科概念，将我国学界已经有了丰厚积累的东方各国问题的研究，以及东方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如东方文学、东方哲学、东方史学等统合起来，使各分支学科突破既定学科的视阈限制，以便打造得以与世界东方学接轨的更宽阔的学问空间和学科平台，使中国的“东方学”与“西方学”、“国学”三足鼎立，形成一个完整的、协调的、而不是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的学科体系。为此，我设计并主持了两次关于“东方学”及“东方文学”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并在撰写《中国“东方学”》的专门著作，力争在将来成立“中国东方学学会”的学术组织，以推动中国“东方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繁荣。

二、东方比较文学

“东方比较文学”这个概念也不是我创制的，但我较早把它作

为比较文学的分支学科的概念来使用它，把它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来看待。

所谓“东方比较文学”，主要是以中国文学为出发点与立足点，以东方（亚洲北非）其他文学为比较对象的文学研究，也包括东方各国文学的区域性、总体的比较研究，即“东方文学”的研究。

我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索引 1980—2000》、《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学术史研究丛书·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等书中，都把相关的研究成果集合在使用“东方比较文学”这个概念之下，做出评述与研究。我在《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各卷中，将中国比较文学分为五个分支学科，即，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学术史；二、比较诗学；三、东方比较文学；四、中西比较文学；五、翻译文学；从而把“东方比较文学”作为五个分支学科之一。

我在《比较文学系谱学》一书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在近百年来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从东西方世界二分的角度看，一个是“中西比较文学”，一个是“东方比较文学”。“东方比较文学”是1980年代之后才大规模展开的。由于历史上东方各国文学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事实联系与交流关系，“东方比较文学”研究范式比起“中西比较文学”来，研究资源更为丰富，更加侧重于文学交流史、关系史的研究，更加注重文献学的实证研究的方法的运用。“东方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形成较晚，对“中西比较文学”范式起到了一种补充乃至纠偏的作用。鉴于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流行“西方中心主义”和“中西中心主义”，把“东方比较文学”作为与“中西比较文学”相对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看待，将有助于建立真正全面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三、宏观比较文学

“宏观比较文学”这个概念我是创制的。在《宏观比较文学演

讲录》中作为全书的关键词。该书认为，在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史及学科史上，虽然并没有人明确区分“微观比较文学”与“宏观比较文学”并提出“宏观比较文学”这一概念，但早在19世纪，欧洲一些学者就已经触及到了宏观比较文学的问题，并论述了它的独特作用与方法。例如，德国浪漫派诗人、理论家与文学史家弗·施莱格尔的“整体描述”方法，斯达尔夫人的所谓“集体性的比较”方法，都与“宏观比较文学”的方法相一致。

我认为，所谓“宏观比较文学”，其实质是“世界文学宏观比较论”，它是以民族（国家）文学为最小单位、以全球文学为广阔平台和背景的比较研究，它以“平行比较”的方法总结、概括各民族文学的特性、用“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的方法揭示多民族文学之间因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文学区域性，探讨由世界各国的广泛联系而产生的全球化、一体化的文学现象及发展趋势。并由此把“宏观比较文学”分为三个层次和步骤：第一，在平行比较中提炼、概括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与“国民文学”的民族特性；第二，在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的横向联系与历史交流中，弄清各国文学逐渐发展为“区域文学”的方式与途径，把握不同的区域文学形成的文化背景、机制及其特征。第三，在了解了民族文学特性、区域文学共性的基础上，把握全球化的“世界文学”如何由一种理想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现实走势。

《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以这三个层次为依据，构建了宏观比较文学的理论系统，并认为“宏观比较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中外文学史、文学理论知识的整合与理论提升，因此从学科建设与学科教育的角度看，应该在大学本科生高年级开设“宏观比较文学”的基础课程，以帮助本科生完成本科阶段中外文学史知识的系统整合，而将此前通行的以学科概论、学科原理及研究方法论为主要内容的“微观比较文学”划归为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以此来解决本科生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纯理论化与繁琐化、比较文学与其他课程的

重叠交叉化、研究生与本科生课程的无层次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分裂化、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不平衡化等困扰已久的问题。

四、比较语义学

“比较语义学”这个概念是我在“历史语义学”、“历史文化语义学”^①的基础上，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立场上加以仿制的。我所说的比较文学范畴内的“比较语义学”，它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一种分支学科。

“比较语义学”就是在跨语言、跨文化的范围与视野中，对同一个概念范畴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交流中的生成与演变进行纵向的梳理与横向的比较，以便对它的起源、形成、运用、演变的历史过程做追根溯源的考古学研究，描述其内涵的确立过程，寻求其外延的延伸疆界，分析某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展变化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从丰富的语料归纳、分析与比较中，呈现出、构建出相关概念范畴的跨文化生成演变的规律。其基本操作方法是“考论”。“考论”就是“考”加“论”；换言之，就是将词语史料的考据，与词义分析、理论建构两者结合起来。

我认为，在比较文学研究及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比较语义学”的方法涉及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第一种，以相同文字（例如汉字）书写的某一个概念，在不同国度与不同语言中的移动或转移，我们可以称为“移语”，这方面的研究也可以叫做是“移语研究”；第二种，就是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所形成的词语概念，叫做“翻译语”，可简称“译语”的研究。

^① 在“历史语义学”与“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出色的研究成果，如冯天瑜教授主编的论文集《语义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冯天瑜著《“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陈建华先生著《“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等。

“比较语义学”的方法，对东亚汉字文化圈区域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具有适用价值，因为其中的“移语”和“译语”较多。近年来，我以这种方法，对中日古典文论与古典美学的相关重要概念做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概念包括“文”、“道”、“心”、“气”、“幽玄”、“物哀”、“感”与“感物”、“意气”等，我还将在《中日古代文论范畴关联考论》（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中，继续展开这方面的研究。

五、系谱学方法

“系谱学方法”是我在区域文学史与学术史研究中，明确提出并加以具体操作和运用的。拙作使用的“系谱学”一词，与法国福柯的“系谱学”概念有所不同，是“系谱学”这一汉字词汇本身所能显示出来的基本涵义。

我在《东方文学史通论》再版后记中曾说过：学术研究大体有两种路子：一种是发掘性研究，一种是建构性研究。一般而论，有些学科已有的、已知的材料较为有限，学者们的主要任务是发掘材料、积累知识，做微观的、具体的研究，这就好比是制作砖头瓦片；第二种情况，是有些学科积累到相当程度，需要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一般，从材料到理论，这就好比是砖头瓦片积累多了，就动手盖房子。盖房子的人也许没有做过一块砖、一片瓦，但他的本事是利用砖瓦盖房子。

系谱学方法，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那种“弥纶群言”的“综合研究”，它在建构、呈现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方面，与历史学方法是相通的，但系谱学方法是将客观的历史呈现与主观的体系构架结合起来。它不仅像一般历史学那样梳理和陈述历史，更要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创制出若干独特的概念、范畴，来整理、解释史料，为某一领域建构相对自足的知识体系，即“系谱”。例如，我在《东方文学史通论》中，用了五个概念，即“信仰的文学时代、

贵族化的文学时代、世俗化的文学时代、近代化的文学时代、世界性的文学时代”这五个时代，来统筹和构架古今东方文学发展史；在《比较文学系谱学》一书中，我用了“比较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研究”这来概括比较文学学科化前后的两个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东方文学史通论》也不同于一般的东方文学史，《比较文学系谱学》也不同于一般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史，都试图是运用系谱学方法，揭示出东方区域文学之间的联系性、整体性，总结出东方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六、传播研究法·影响分析法

“影响研究”这一概念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概念，“传播研究”是传播学的基本概念，都不出自自我之手。但是，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及相关论文中，将比较文学中通常所说的“影响研究”加以重新厘定，将“影响研究”与“传播研究”区分开来，则是我的所为。

长期以来，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将“法国学派”与“影响研究”看成是一回事，认为“法国学派”是“影响研究”。我将法国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主张及研究特色做了辨析，认为梵·第根等人所推介的国际文学之间的“经过路线”的研究，伽列、基亚等人所主张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及其方法，严格地说都属“传播研究”方法。如果要对法国学派的研究倾向和特点加以概括的话，将它们称为“传播研究”更合适些。

“传播研究”是建立在外在事实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文学关系研究，本质上是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它关注的是国际文学关系史上的基本事实，特别是一国文学传播到另一国的途径、方式、媒介、效果和反应，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统计学的、实证的方法，属于文学的外部关系研究的范畴。在“传播”研究中，除非特别需要，它一般不涉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判断，

而只关注其传播与交流情况。与传播研究相关的重要概念是“渊源”、“媒介”、“输入”、“反馈”等等。

“影响”研究则是一种探讨作家创造的内在奥秘、揭示作家的创作心理、分析作品的成因的一种研究，它本质上是作家作品的本体研究，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它是建立在文本分析、文学批评基础上的审美判断，其基本研究方法主要不是实证，而是作品的文本分析，因此准确地应该称之为“影响分析法”。它主要研究“影响”与“接受”、“影响”与“超越”、“影响”与“独创”之间的复杂关系。与“影响”密切相关的范畴是：“影响”与“接受”、“影响”与“超越”、“影响”与“独创”。

七、平行贯通法

1980—1990 年代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由于美国学派对所提倡的“平行研究”并没有做严密科学的界定，导致，即“X 比 Y”式，或“ $A : B = A + B$ ”这样的简单比附的文章大量流行。对此，方平先生提出了“ $A : B \rightarrow C$ ”平行研究方法，虽有了质的飞跃，但也有局限，那就是仍然没有摆脱 A 与 B 的两项式比较。它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但结论又往往由于材料的两极性，而缺乏由众多事实材料而提炼为规律性见解的基础。其 C 的部分，也难免是用有限的事例，来证明众所周知的、或没有多少创新的平凡见解。

用来比较的事项越少（最少的是两项式比较），其各自的共同点、特殊点便各占一半，这样得出的相似或相异的结论，都是很有局限的、缺乏普遍性价值的；而用来比较的事项越多，则看出的共同点就越具有普遍性，所总结出的各自的特点也就越具有个别性，这样的“特点”才是真正的“特点”。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及相关论文中，化用方平先生的“化学方程式”，而提倡的“平行贯通法”，并把这种方法表示为：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cdots \rightarrow Y$ 。

在这里，X1、X2、X3、X4、X5……表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同类材料。它们可以是作家作品，可以是概念、术语和命题，也可以是彼此关联的不同的学科中的相关问题；Y则表示研究者的新的见解。这是最高级的平行比较的模式。是一种既有思想贯穿、又有丰富的文献来支撑的高端复杂的比较文学研究。它将比较研究的范围广泛扩大到不同文化体系中的相似、相通的诸多事物，进行全方位的、纵横的比较，目的是为了呈现最大范围的相似、相通性，和在这个基础上呈现最高程度的相异性或特殊性。在这里，“平行研究”不再是“平而不交”的研究，平行的两条线“=”形变为纵横交错的“井”字形这就是纵横交叉的“贯通”，“平行研究”也就变成了“平行—贯通”的研究。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等著作中较为成功地运用过这种方法。

八、超文学研究

“超文学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概念，是我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及相关论文中提出来，指的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

“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特别强调的“国际性”，也就是“跨文化”。强调：单单“跨学科”而没有“跨文化”，不属于比较文学；只有跨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才能归入比较文学的范畴。由此可见，“超文学研究”与美国学派界定和主张的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在“超文学研究”看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方法；同时，“跨学科研究”是

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也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多年来人们所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还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科学”等。但是，不言而喻，决不可把这些研究拉入“比较文学”，因为它们“比较文学”所无法涵盖的。

我使用“超文学”这一新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和主张，尽管美国学派的想法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地被普遍接受。为了与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划清界限，我使用“超文学研究”这一概念，试图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大而无当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控制约束，以防止比较文学学科的自我解构。

九、涉外文学

“涉外文学”是我创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指的是“涉及外国的文学”，包括以外国为舞台背景，以外国人为描写对象，以外国问题为主题或题材的作品。

“涉外文学”中的“外”（外国），是一个可以双向指涉的关系概念，而不是以某国为特定立场的单向性的特指概念。例如，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外国”；而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又是“外国”。在各国文学当中，凡涉及“外国”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归为“涉外文学”的范畴。

提出“涉外文学”这一概念与法国学派“形象学”有重合之处，但又有不同。“形象学”这一概念强调“形象”。“形象”固然是文学作品对异国进行反映和描写的主要途径与手段之一，但它又不是唯一的途径和手段。作家对异国的描述与评价常常是通过感想、议论等非“形象”的手段来表达的。而且，法国“形象学”